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六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七期 ——
（二〇一〇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2a）

【知情者言】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
【不吐不快】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黄家生
【思考研究】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李 超
【回首文革】	“王、关、戚”与《红旗》杂志	杨永兴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六）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知情者言】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 顾英奇 •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〇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 《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

【不吐不快】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 黄家生 •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

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罗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

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声明：写此信，纯属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志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医务、监管人员个人；本文复述记录，谴责惨剧，绝无追究这些同志之意。）

□ 《炎黄春秋》 2010年第1期

~~~~~

【思考研究】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 李 超 •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也指出，刘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黄春秋》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以下简称《抢救》）而且有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对刘少奇遭到残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抢救”刘少奇，从根本上误导了历史事实。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对刘少奇逝世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

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尽管这一叙述非常严谨，对具体细节的表述也很简略，但与《抢救》所叙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在“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刘少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原来他的体质还是不坏的，直到他逝世时，还不满71岁，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给以有效的治疗，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1968年初刘少奇发病到7月间，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7月5日“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认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建设住院治疗，而这一建议竟“没有得到批准”。这哪里是《抢救》作者所说“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刘少奇发病后，虽然一时脱离危险，但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7月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卧床。10月9日以后已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刘少奇的病情报告也说：“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晚，还要把身上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刘少奇，硬是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往开封。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更加恶化，而从北京护送来的医生、护士未等病情稳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后，刘少奇就去世了。

四、《抢救》作者说什么对刘少奇的医护“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的”，还说什么刘少奇病情恶化“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我相信医疗专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因脑血管发生病变，行走困难神志不清后，医生竟在病历中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刘少奇去世时，头发竟有一尺多长，对刘少奇的护理是怎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抢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医生，不知作者对刘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总之，《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当然，有些医务工作者，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医护工作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当权者，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极左路线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但是现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同志，可能就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  
【回首文革】

“王、关、戚”与《红旗》杂志

• 杨永兴 •

提起“王、关、戚”，年龄小的可能不知道，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他们的成名，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革时期是《红旗》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文革初期，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或评论员文章，就可能改变当时政治的风向。而当时的《红旗》，虽然仍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个副总编辑。他们3人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进入《红旗》之后却都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名人”，而且都被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成为中共中央的“秀才”，毛泽东的“笔杆子”。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红旗》杂志为他们3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平台，他们是《红旗》的“宠儿”，《红旗》的“红人”，“《红旗》之星”。

—

他们3人当中，王力在《红旗》的资历要比关锋早，而关锋又比戚本禹早。王力是《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任编委，对此他颇为自豪和得意，称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早期曾用笔名“王力”，写了一本描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晴天》，“各根据地都翻印了这本书，毛主席也看到了”，得到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赏识。而据王力自称，他“直接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是从1957年开始的”，“在1957年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欣赏”，还“参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的整理和发表的工作”，“1958年创办《红旗》杂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参加创办《红旗》，作为主管国际问题的编委”。

王力还说，“后来（引者注：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后）实际上我的工作既不在中联部，也不在《红旗》，而是钓鱼台。钓鱼台盖起来不久，就开了一个八号楼住秀才班子。毛泽东、常委、书记处直接抓这个班子，为他们起草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这个班子是从同苏联打交道开始。赫鲁晓夫变脸了，毛泽东抵制了他的‘对表’。中国要独立自主，决不能屈从苏联的指挥棒。这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钓鱼台是1959年盖起来的。1960年2月，我跟康生去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因为王稼祥病了，康生是临时决定去的。这是中苏第一次公开冲突。接着就是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我是十下莫斯科，10次跟苏联人打交道，有9次都有康生，康生只有一次裁军会议没有去，10次都有我。”据称，对此，“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陈伯达，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而且从1960年起，王力就被授命可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4年起又被授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对于王力能够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说法：一种是认为王力的受重用“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另一种则是王力全然否定第一种说法。对于王力的辩驳，个中缘由是复杂的。除了王力自己的才干和相当强的政治头脑外，时运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最高领导人赏识而受到重用的“笔杆子”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某位领导人的推荐，要想在短时间内就“出名”，也是比较困难的。

担任《红旗》编委后的王力，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文章，其中以他和乔冠华、姚溱联合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居多。“于”指的是乔冠华，“乔冠华过去在重庆时用过笔名‘于怀’”，“‘兆’则是‘姚’的偏旁（引者注：应为左边），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外交英才乔冠华》中写道：“50年代末，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应毛泽东倡议问世。该刊的国际述评初时就由乔冠华参与执笔，署名‘于兆力’。……‘于兆力’的文章曾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美国国务院曾把‘于兆力’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其权威性可见一斑。”至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究竟是谁写得比较多，叶永烈在其著作中指出：“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王力也称主要是自己写的，而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中也只提到初时“由乔冠华参与执笔”。另外在《姚溱纪念文集》中，也仅收录了一篇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古巴人民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可见，王力的“贡献”可能更多一些。

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王力还参与起草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包括中苏论战期间的“九评”）和中共领导人的报告、文件。王力说，“引起苏共抗议的3篇文章，主要是《列宁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是陈伯达主稿，我和朱庭光协助的”；“1963年4月开始在杭州起草‘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协助主席的有陈伯达、王力、范若愚”；“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一篇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时写国际文章主要是我，秀才班子已没有了”。他还强调，“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和书记处的同志经常直接布置王力的工作。过去搞人民公社六十条，一搞就是半年。以后还参加搞工业七十条”，“还到杭州参加协助毛主席起草农村十条（即‘前十条’）。以后又协助毛主席起草二十三条”；“此外，周总理的每次重要报告，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王力也都参加起草”。王力以上所提到的文章都相继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但是，使王力在中共领导最高层里真正出名的，却是由他执笔的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据称，当时中共中央“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文章发表在1965年9月3日《红旗》第19期，其重要性在于它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这一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文章称：“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此文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赏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林彪就“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林彪亲自接见了，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在“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就这样，一篇文章使王力再次成为《红旗》的“宠儿”，不久就担任了《红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之一。

## 二

而《红旗》的另两位“明星”：关锋和戚本禹，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的赞赏而一举成名的。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庆云县，为此“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1939年改名为关锋，“‘锋’字源于他的原名玉‘峰’”。1944年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后得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康生的赏识，1950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两年后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被借调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就这样，关锋从地方到了中央，迈出了他的人生“辉煌”的关键一步。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关锋表现得尤为积极，不仅“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而且还“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就是这样一个“左派新秀”，在《红旗》刚创刊就被调入该杂志社工作。

对于关锋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情况，霞飞在文章中写道：“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引者注：半年后），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而叶永烈在采访关锋问及他是怎样引起毛泽东注意、得到毛泽东垂青这一问题时，关锋称，“那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那时，关锋常喜欢写点杂文、杂谈之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回，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料，每日翻阅各报的毛泽东，竟很仔细看了此文，毛泽东为关锋的文章写下一段批示。由此，关锋声誉鹊起”。“不久，关锋出任《红旗》常务编委”，并担任《红旗》哲史组组长。其间，关锋在《红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抓住时代的精神》（1958年第12期）、《论对立面的同一》（1960年第15期）、《调查研究的态度》（1961年第5期）、《真理的全面型》（1961年第21、22合期）、《利害篇》（1962年第13期）、《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1964年第4期）、《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读王杰同志的日记》（1965年第12期）等。

相比之下，戚本禹进入《红旗》要远远晚于王力和关锋，1965年下半年他才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但是“据关锋说，‘王、关、戚’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3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可见戚本禹的确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人物。当然，戚的发迹同毛泽东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1931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后“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因

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1957年、1958年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使毛泽东知道了戚本禹这个人。

所谓“八司马事件”，指的就是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整风运动期间，林克、戚本禹等8位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戚本禹曾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对此，容全堂在《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辩证到，戚本禹等8人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何载的批评，“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说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在1958年4月召开的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上，他们“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但是毛泽东的立场却是站在戚的一边，他在3月成都会议期间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1962年戚本禹又一次因给领导提意见而“挨整”，这次又是毛泽东授意田家英负责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1963年，戚本禹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站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戚本禹在文章中不但“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而且还“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戚的这一观点遭到当时学术界的反对和批评。但是，毛泽东看后，却“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对此，徐思彦在其文章《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中提到，“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此后，戚本禹接连写了一系列批判李秀成的文章，紧紧抓住叛徒这一问题，上纲上线，而他本人也就此“出名”，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随之就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

1965年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成为《红旗》响应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一篇文章。对此，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5人的谈话中曾提到，“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 三

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3人在“文

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1966年3月24日，戚本禹等3人在《红旗》第4期发表了点名批判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4月5日，关锋、林杰两人在《红旗》第5期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5月11日，戚本禹又在《红旗》第7期发表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0月1日，《红旗》第13期发表由陈伯达、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首次公开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3日，《红旗》第15期又刊登了王力等3人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戚本禹等3人写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两篇文章。

1967年1月16日，《红旗》第2期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讲话写成的，“是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它不仅介绍了上海夺权的经验，还主张将其推向全国，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它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2月3日，《红旗》第3期再次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全面夺权”斗争进一步纲领化、系统化。该社论是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关于“光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不够，光号召夺权还不够，还要有纲领性的东西”这一指示写成的。王力称，“这篇文章很重要，不能仅仅看成一篇文章，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新阶段，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决定性的纲领性的文件”。社论在肯定上海夺权的基础上，规定了夺权的性质和目标，并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夺权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以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另外，社论还提到了在夺权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而3月30日《红旗》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正式拉开了“打倒刘少奇”的序幕。戚文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首次在中共中央报刊上公开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文革中独有的不点名却人所共知的方式对刘少奇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大批判”、“斗、批、改”阶段。王力称：“文章是毛主席直接要戚本禹写的，没有拿到中央文革。当时我主管宣传，没同我商量。毛主席定了以后才交给我广播的。”

可见，1967年上半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人的最辉煌时期，但是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而“王、关、戚”事件的发生，使《红旗》在1967年11月23日第16期到1968年7月1日第1期，这7个月期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实际上已经处于停刊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王、关、戚”与《红旗》的关系非同一般。

□ 《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六）

• 舒 云 •

3 1、山海关机场为什么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措施？

零时18分，“大红旗”只用了平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到了山海关机场。林彪等人没等客梯车开来，舱门也没关好，零时32分飞机就慌慌张张起飞了。

机场的滑行道和跑道平行，平时跑道是空的，以便随时迎来送往。准备起飞的飞机一般先停在调度室前的停机坪上，得到调度室的起飞命令后，先滑到滑行道，再滑到跑道头。而256三叉戟起飞时，只有起落架上的滑行灯打开了，机场没有打开跑道灯，调度室也没有给起飞命令。

山海关机场是歼击机训练的小机场，滑行道不宽，而三叉戟又太“胖”，加上滑行时动作太急促太猛烈，像个醉汉，还没有对正跑道就先拐了弯，一个主轮偏出滑行道，压进了黄豆地，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的沟，轧断的黄豆秆立即被气流吹跑了。幸亏三叉戟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三叉戟从黄豆地里“挣扎”出来，又轧坏了两个跑道灯。在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联络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三叉戟在跑道头500米处就强行起飞了。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一看飞机没挡住，就向空中打了两枪。

八三四一部队也追了，一路追到山海关机场，这时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但是，机场乱成了一锅粥，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

要制止强行起飞，只有采取最根本的措施——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两辆大卡车开到跑道上。或者把加油车开到跑道中央，三叉戟转弯就转不过来，这时挡住，就挡住了。场站倒是派加油车去堵了，但三叉戟“气势汹汹”地滑过来，加油车上的两名干部先躲了，开加油车的新兵刘三儿也开着车躲开了，让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话又说回来，谁敢拦？油罐车撞坏，机翼灯也撞坏了，地面上的人们已经吓得半死。这不是一般的飞机，这是专机，撞坏了中国第二号人物的专机，非蹲监狱不可，搞不好小命也没了。除非下死命令，讲清楚，机场才敢拦阻。可上边的命令并不是一定要挡住，非常含糊，只是不让起飞。从上到下都不明确，不让起飞，可是它强行起飞又怎么啦？这是专机，林彪的专机，本来山海关机场就没有管理的权力。谁能想到它会强行起飞？急急忙忙，通知不让起飞，所有的人都没有认为是紧急情况。事后翻过来想，赶快打电话给机场，把飞机封起来，开车到跑道上，几个措施都没有采取，到时候就没说话的余地了。

事后看，整个事情非常像一个精心的“策划”，也拦了，也追了，也禁止起飞了，但这一切，仿佛是“欲纵故擒”，就是要让你成惊弓之鸟。只要起飞，没有考虑的余地，必死无疑。上天容易，可你不能永远呆在天上，你总要落地，你往哪里落？事先没预报，机场频道不知道，怎么落地？如果被当成敌机打下来呢？一般导弹就可以打下来。而且越境后，越往北飞越是山。到伊尔库茨克远了，茫茫黑夜，也不一定找得到伊尔库茨克。虽然有自动领航设备，可就你一个飞行员，你忙得过来吗？那个预料中的结局似乎在起飞前就注定了。

3 2、机组人员不全，潘景寅怎么就起飞了呢？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误传）。吴法宪感到情况严重，不过还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几十分钟的车程，他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胡萍也给潘景寅打电话，飞机一概不准动。可为什么飞机还是起飞了呢？有人说：如果不飞，那就是英雄飞行员，立功了，整个100团都要立功。事后看，这话也不一定对。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潘景寅怎么

可能不起飞呢？林彪的红旗车开进了机场，潘景寅听见有人喊，首长都到了，飞行员怎么还没有到？潘景寅慌忙跑出门，一路跑向256三叉戟。因为事先林立果有过加油的电话，三个机械师已经被潘景寅叫起加油。他们打开三叉戟的舱门，叶群迫不及待从工作梯爬上了飞机，林彪也跟着上了飞机。叶群命令快起飞，潘景寅敢不起飞？不要说先前潘景寅已经被灌输吴法宪有问题，就是老吴没有问题，老吴毕竟只是空军司令员，而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啊，该听谁的，不言而喻。

机舱门还没有关上，飞机就滑动了。

五个正在跑向飞机的飞行员都呆住了。他们是：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服务员魏秀玲。只差了一、两分钟，他们就上飞机了。

三叉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运输机，发动机启动快，除了利用地面专用的启动车外，也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进行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据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分析，当晚就是利用机上设备启动的。而且中央发动机启动后，就可以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对另两台发动机进行启动。这样就大大地节约了在停机坪的时间。还有只要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种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后，不需要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起飞升空。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三叉戟的起飞没有任何疏漏。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加油等，离不开机械师，连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身上。但一旦飞机起飞动作完成，平稳飞行，机械师的作用就不大了。到了天上，全靠潘景寅一个人“拳打脚踢”了。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等机组上全就飞了呢？

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

潘景寅性格急，遇事紧张，又不果断。和他一个机组的飞行员说：每次飞行，潘景寅的脸都红极了，下飞机满头大汗，别的飞行员就不这样。50年代末潘景寅在沈阳出过一次小事故，天降大雪，跑道还没有扫出来，他急着飞。在同组飞行员劝说下，又停了一会儿，他还是执意起飞。起飞时，跑道不够，飞机冲着跑道上一个大雪堆扎进去，要不是副驾驶马和使劲一拉驾驶杆，机头翘起，飞机就一头钻进雪堆里了。但飞到天上，发现一个起落架被雪堆撞坏了。机组几个人商量，先在空中转耗油，差不多了再落地，用一条腿侧着落地。这样，飞机冲到跑道头，撞坏了一点点，没有机毁人亡。

很多内行人都说：如果机组全上，256三叉戟摔不了。

有人说潘景寅知道逃跑，故意拉下了机组成员。但种种迹象表明，潘景寅事先并不知情。否则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他不会吃安眠药。9月12日下午，潘景寅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他吃了三片安眠药，去理发室理发，理完发安眠药正好发挥作用。没想到还没有出理发室，出发命令就到了。首长要飞机，不光林家，都是随叫随到。专机没有起飞时间，首长来了就是起飞时间。但过去从来没有首长到了飞行员还没有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都是机组先到机场等首长，都养成习惯了。没有首长到了而机组还没到的先例。所以，这一次潘景寅更加紧张，让起飞，就快快起飞吧。

如果不起飞，一切都解决了。就是飞，也不能一个人飞啊。怎么就一个人把飞机飞上天了呢？叶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机组人员全上来再飞啊。大型飞机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操作，这可是创下了中国航空史上的记录。大飞机可不比汽车，再急也不急这几分钟嘛。机组好多人没上去，一个人怎么能飞？又是夜里，再大胆也不敢飞啊。如果潘景寅拖延，林立果可能打死

他吗？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了飞行员，谁会飞三叉戟？他能开“大红旗”，可是他都没开，因为车上坐的是他的父亲。更不要说三叉戟了，他只会坐，不会驾驶。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吗？不敢。当然最后鱼死网破，他打死潘景寅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还没到那个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释一下，再等个一、两分钟，机组就全到了。如果等一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飞不成了。另一种可能是机组人员全都上去。如果机组人员全在飞机上，分工合作，靠着集体的智慧，飞机就有可能成功迫降在温都尔汗的土机场上。

时任空军航行局局长的尚登峨回忆：9月12日下午，胡萍对我交代，林彪专机要到山海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那天晚上11时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航线的事情，刚回到家，值班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吴法宪来电话，问山海关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拿电话请示胡萍，胡萍说，你别管了。尚登峨就睡觉了，突然被电话铃惊醒，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一个人。再重复一遍，这时起飞不到四、五分钟。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起床，平时到办公室要十分钟，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我给山海关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没上去。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我是飞行员出身，飞行20多年，军用运输机都是两个人飞，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开车滑出，没来得及加油就起飞了。这飞机起飞前，并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

这时参谋长梁璞来了，尚登峨让陈联柄把详细情况给参谋长报告。他看标图，搞不清楚往哪飞。调去的是林彪的专机，他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机上还有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没想到。只想是不是劫机？梁璞叫他下去，李德生在指挥室，问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的？什么时候入党的？文革以来的表现怎样？……尚登峨说，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还要给西郊打电话，同时看标图。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问号很多，谁搞鬼？既不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往蒙古方向飞？国境线除赤峰有个机场，没有可降落之地。尚登峨忽然想起，经副参谋长王飞同意，周宇驰要过航图，并让划出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顿时不祥的感觉弥漫全身，他马上报告了参谋长梁璞。梁璞让他再画出同样一张航图，交给李德生。

飞机上的无线电是不是开着呢？正常情况下，飞机开车后，滑行前，必须打开机上所有的通话设备。因为飞机的一切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部门的许可，方能进行。有时开车前就要将电台先打开，与指挥台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当时空军指挥所通知，北京周围所有机场都打开跑道灯和夜间降落设备，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要三叉戟到北京落地，北京地区所有机场都可以随时落地。电台开关就在飞行员头顶部，轻轻一拨就可以打开，地面的声音就可以充满整个机舱。吴法宪叫胡萍拿着话筒喊，以周恩来的名义，叫他回来。山海关机场、西郊机场和空司指挥所，所有的对空台都在呼叫。

从雷达标图看，三叉戟无动于衷，直接飞向中蒙边境，向西一段是山区，飞机爬高，越来越慢。胡萍分析，潘景寅不是不敢，机组人不够，他忙不过来。那时对上面的矛盾也搞不清楚，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想：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奇怪，这是往哪里飞呢？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潘景寅的心理状态，飞往国外，是他始料未及的。现在整架飞机包括林彪的命运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肯定更加紧张。三个机械师可以商量，但毕竟又没有飞行员内行。至于怎么落地，只好听天由命了。

3 3、起飞前，潘景寅知不知道要飞向哪里？

在256三叉戟上天前，潘景寅肯定不知道是要飞出国境。他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改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像这样上天前根本不知往哪里飞的事情，以前也有过。1967年7月20日，专门从北京调两架专机到汉口，没说谁用，一架有床有桌子，一架有座。突然毛泽东坐汽车来了，直接上了潘景寅的这架飞机，潘景寅赶快从飞机上下来迎接。那时潘景寅是副团长，另一位机长王进忠团长也被调到这架飞机上。潘景寅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到了天上，毛泽东才说去上海。

如果飞国内，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内航线，到哪都有保证，可是怎么让飞蒙古的乌兰巴托？他哪里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国外去。不执行吧？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半夜里慌慌张张飞国外，机组的人员都不全，就催着起飞，这决不正常！潘景寅飞伊尔18出国很多，每次都要准备很长时间，哪有到了天上，才说去国外的。何况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这不是叛逃吗？

256三叉戟机毁人亡，我们不知道林立果是怎样骗潘景寅的。但雷达显示，三叉戟起飞后的转弯航迹非常不正常，延迟了4分钟，而且以后的转弯动作所用的时间也是平时的十倍。60度用了6分钟，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飞机上的转弯感觉不到，只能从仪表上读出来，又是夜间，仪表板红光照明，比白天读表更困难。潘景寅变速很慢，转弯坡度很小，迟缓，不规则，而且过了头，超过15度，再飞就成了360度，掉头回山海关去了。20分钟后，才稳定在325度的航向上。

100团政委安治梁回忆：我对潘景寅印象很好，他当大队长，我作为保卫干事负责审查他，不错。后来他当团长，我当政委，商量工作，双方印象都很好。这个人很正直，没花花点子，很老实，很稳，不大说话。声音不大，软软的，一说话就脸红。9月12日刚吃过晚饭，6时多，山海关来电话调飞机。我刚回到北边宿舍，又马上到机场。老潘对我说，老安，我刚吃了两片安眠药，想休息了，这劲还没过。9月12日午后，潘景寅向256三叉戟机组下达命令，准备执行林彪专机的任务。因为你不知道首长什么时候用飞机，只能见缝插针抓紧休息，所以潘景寅下午就吃了安眠药准备睡了。他没想到晚上走，我嘱咐副驾驶陈联柄关照一下。天黑下来，灯开了，我们在停机坪等林立果来。等了一个小时，我和潘景寅闲聊，他情绪正常，一点不紧张。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有反映，潘景寅情绪低落，上边斗争那么厉害，他多少知道一点。潘景寅与周宇驰一块调到空军，所以关系很好。潘景寅到航校学的飞行，比正常学员晚来一段。表面上很老实，有心计，想问题比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从技术上说，潘景寅不那么精干，技术很一般，实际上技术不如100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的李克修，也不如副驾驶陈联柄和康廷梓。但潘景寅因为职务高，被定为林彪专机的飞行员，李克修就成了潘景寅的“备份”，而陈联柄和康廷梓则成了副驾驶。

潘景寅的心态，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航迹似乎可以反映潘景寅的心迹，他的思想斗争一定非常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温暖的家，他为什么要跑到国外？跑到国外他算什么？飞机肯定是开不成了，那他能干什么？想回国也不可能，返航？返航也不好办，首先就违抗了命令，何况油也不够了，真是进退两难啊。

34、苏联外交官凭什么说256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

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发表阎明复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介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新出版的

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披露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打下来的？没有说。

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还是没有说。

为什么不提256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矛盾的。

这位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名字是毛泽东1957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职，在华12年。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华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首先，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对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根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回忆：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受政府委托通知中国飞机坠毁，并提出口头抗议，要中国政府就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其次，不是“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而是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中国飞机坠毁，到了现场。而且明明是苏联人连续两次到坠机现场，拍了照片，拿走了飞机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又挖开坟墓，拿走了林彪和叶群头骨。这位前苏联外交官居然说是蒙古人挖开坟墓！还含糊地说是蒙古人打下来的。

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这段回忆说明，他到现场时，什么也没看见，林彪等人已经埋葬了。可是，顾大寿说是蒙古人照了照片，把所有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既然顾大寿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又在回忆录中说飞机上发生过枪击？说“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

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

看完这段回忆录，我专门问过王中远老师。他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比顾大寿先到坠机现场，并亲手掩埋林彪等人遗体。他说他没有发现弹洞，飞机已经解体，散了一地，不可能发现弹洞。

另外可以肯定，飞机上的四位飞行员都没有枪。

关心九一三事件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004年9月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驻莫斯科记者采访过退休的前苏联克格勃头子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当年验证了林彪、叶群的头骨。扎格沃兹丁将军还谈到256三叉戟坠毁前的飞行路线，说飞到了苏蒙边境。还说现场验证了飞机上发现的所有枪支，没有一支枪发射过子弹。

那么，顾大寿说的机舱上的弹洞由何而来？

顾大寿回避了苏联人两次到坠机现场，除了拿走林彪和叶群头骨，还拿走了发动机和黑匣子。

为什么只字不提黑匣子？

看来这位吹嘘亲临现场的前苏联外交官也有可能满嘴谎言。

35、256三叉戟真的是苏联打下来的吗？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说256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说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打的，这不对，不可能是蒙古空军打的，有能力发射地空导弹的军队只能是前苏联驻蒙古的军队。当然是击伤，而不是击落。因为256三叉戟采取了迫降措施，而空中又没有散架。这也可以解释256三叉戟空中着火，以及来不及耗油就紧急迫降的原因。

1960年5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蒙古。5月31日，中国与蒙古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中蒙两国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从中国独立后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12月26日签订两国边界条约。虽然如此，但因为1960年中苏交恶，蒙古紧跟前苏联，也开始与中国为敌。1963年7月，蒙古与前苏联秘密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很快苏联派出许多勘测小分队，借口到蒙古铁路两侧及以东找水，实际上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1964年，蒙古赶走中国援蒙工人，引进苏军建筑旅，在乌兰巴托等地修建了大批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南部，在中蒙铁路沿线修建军用机场和各种设施。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第五条规定：缔结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共同采访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之后，前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活动开始公开化。

1967年3月，蒙古和苏联的国防部长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4月，前苏联陆、空军作战部队开进蒙古，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大规模阅兵式，不仅有蒙古军队，也有苏联驻蒙古军队。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以及80余辆坦克，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依次驶过检阅台。

1968年，苏联驻蒙古军队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和机场等设施，其中一个现代化军用机场在乌兰巴托以东30多公里的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还有两个现代化军用机场在中蒙铁路沿线。此外，还修建了多处防空导弹阵地，以及大型野战后勤基地。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的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4月，中苏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联进一步在蒙古增兵。驻蒙陆军达到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拥有坦克1800辆，战车和装甲车2500辆，大炮1400门，统归集团军指挥。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升任中将。部队部署重点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距离中国边界240公里的重镇沙音山达也驻有苏军。驻蒙空军有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除了乌兰巴托等四个大型机场，还修建了三个野战机场。共有固定翼飞机192架，直升机123架。苏军驻蒙的防空部队有两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拥有可携带核弹头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器22部。此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

苏联驻蒙军队占据了55座兵营，共有8万多人，作战部队有5万多人，包括2个摩托化步兵旅，2个独立团，11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是苏联驻蒙军队的重点，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2个防空导弹营。

苏联驻蒙古军队如此巨大，又经常演习，耗费了前苏联天文数字般的军费。直到1988年12月，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宣布两年内全部从蒙古撤军。

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的孙一先回忆：我于1965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1973年回国，其间曾担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全过程。在蒙古，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虽然1971年，中国和蒙古的关系渐渐缓和，8月20日，中国驻蒙古大使在空任五年后，许文益上任。但紧接着发生九一三事件，苏联驻蒙古军队并不清楚上层的变化，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蒙古的安全。256三叉戟飞越国境，进入蒙古境内几百公里，目标大，飞得又慢，当然被苏军雷达误为侦察机，被导弹击中是毫无商量的，但苏联很快发现打错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苏联如此积极，却如此沉默了。

36、 周恩来凭什么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1971年9月19日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二秘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开乌兰巴托回国。在这天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国内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孙一先到乌兰巴托市周围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导弹发射架都装上了防空导弹，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在旋转。市区苏军的军用汽车比往常增加，铁路两旁的苏军基地也格外繁忙。距乌兰巴托市50多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载重汽车进进出出。几十个战备油罐群，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还站上了岗。距乌兰巴托市100公里的巴彦机场，停在滑行道边的歼击机都脱掉了“衣服”。飞机不断起落，却不像是平常训练。乔依尔车站以北20多公里有苏联空军的一个大型机场，在密闭的列车里都能感觉到轰鸣的刺耳。

中国民航飞机坠毁，为什么驻蒙古的苏军也凑“热闹”呢？

中国边防城市二连浩特，车站内外军人也明显增多，干部都佩戴着枪。集宁停靠的一列军用列车正往下卸军车和重型武器。边防站的王站长告诉孙一先，现在是一级战备，孙一先想，难道真与那架失事飞机有联系吗？

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孙一先把自己标的现场位置图拿出来。周恩来问：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直线距离700多公里。山海关在什么地方？多伦呢？贝勒庙呢？周恩来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用力一划，微微点了点头。孙一先大为吃惊，那架失事飞机不是迷航，而是叛逃！他猜想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这时已经是9月22日凌晨1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来了。总理只介绍了李德生，让孙一先继续汇报，按提纲讲。孙一先感觉周恩来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闭着眼睛打了一个盹。他想，总理太累了。周恩来听完孙一先的汇报，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是怎样坠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也参加。他们拿着照片到东大厅，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际泰是飞行员出身，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为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着陆，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磨擦，骤然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的情况看，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解决办法，虽然不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都是外行，一致认为李际泰说得有道理。

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的飞机，并与驾驶员及有关地勤研究一下。

符浩建议，看飞机时，应该把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带上。

三叉戟是英国原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中短程的三个发运机的客机，根据欧洲各航空公司提出的第二代喷气客机的要求研制。1957年设计，1959年开始生产，1962年1月首次试飞，1964年春投入航线使用。一共四种机型，共生产了117架三叉戟，其生产线于1978年关闭。三叉戟IE型是加大航程型，增加了燃油量，载客量也增加到115人。中国先后进口了30架三叉戟，用于民航飞行。现在我国进口的三叉戟都已经淘汰。航空博物馆存有一架三叉戟。

10月1日凌晨2时，一行人去西郊机场看252三叉戟。

空军参谋长梁璞听说飞机是擦地皮着陆起火爆炸，有点意外，说在夜里能找到这么一大块平地难度相当大。潘景寅的驾驶技术还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飞回这批三叉戟，是他带队飞回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分析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的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看来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梁参谋长同意这个分析，认为迫降时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地，猛一擦地可能“飘”起来。

周恩来根据李际泰等人的纸上谈“机”，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这是息事宁人。也就是说，256三叉戟坠毁由中国负全责。也许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但 3 8 年后再看，这决不是科学的结论。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